

第一章 导 论

资本是极其宝贵的稀缺资源，在经济增长和快速发展中起着必不可少的推动和决定性作用。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直接制约着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没有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就不可能发展和扩大再生产，也就缺乏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而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的核心内容就是资金融通。能否通过资金融通迅速筹措到经济增长和发展必须的巨额资本，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1.1 温州民间融资的基本概况

改革开放后的温州在既无内扶（国家投资或政策扶持）又无外资（包括港、澳、台投资）相助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的努力和民间资本市场的“魔力”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的所需资本金问题，完成了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创造了“温州经济模式”的神话，在全国成为一个耀眼的亮点。目前，就全国范围来说，温州已形成了私营经济先发的优势，有比较雄厚的资本基础，资本金合计超过 1000 亿元。据统计分析，2000 年温州市国内生产总值 825 亿元，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 464.89 亿元，年末各项存款余额 927.72 亿元。^① 私营企业发展很快，而且相对比较成熟，有属于他们自己所有的厂房和庞大的固定资产，有多个私营经济开发区，有各种配套的生产要素市场。私营经济有他们各自的商业网和信息网，承担多种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有充满活力的各种专业市场，并已开始实现产品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分工

数据资料参见 2001 年《温州统计分析》第三期。

合作，使千家万户中小企业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在经济规模上温州私营经济开始从“低、小、散”向股份制经济、规模经济转变，形成了上规模、讲质量、重效益的经营观念，出现了一批上规模上档次的私营企业。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上，相对其他经济成分而言，私营经济早已成为增长最快、适应力最强、贡献最大的生力军，成为温州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

温州人善“商战”会经营敢冒险其独特的近乎天然的商品意识，使其在并无任何优越条件的情况下，走出了一条包括民间融资在内的成功的发展路子。在资本金的形成方面，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与内地一样面临十分严重的资金短缺的困境：对内，国家投资甚少，也没有政策优惠，基础设施和条件甚至不如一般的内地。这是因为温州地处偏僻，无自然资源优势，交通闭塞，不属于重要发展基地；对外温州并无地缘和相邻优势不可能获得大量的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外商投资。国家在温州没有什么重大企业，乡镇企业也很不发达，谈不上更多的固定资产积累。温州原始资本金的形成和积累，主要是依靠他们自己依靠他们自己的智慧依靠创新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依靠各种方式的民间融资，融通和盘活手中的现金，发展并形成独树一帜的民间资本市场。

温州向来是浙南的经济中心属港口城市物产丰富商业、手工业发达。在清初，钱铺、典当、民间借贷已很活跃。1876年（光绪二年）辟为通商口岸以后与上海港、宁波港经济密切相连洋货、外币纷至沓来；“申洋”“甬洋”和侨汇成为温州金融特色。近代金融业已有100余年历史。在20世纪20年代末钱庄鼎盛时达100余家后几经起伏，到解放前夕尚有33家。钱庄很早就组建行业同业公会，协调汇率、利率，交换头寸讯息，成为推动当时温州地方经济的支柱。民国以前，大清银行、四明银行在初创时期就在温州设立分号。民国以后各式金融机构齐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二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库

(中央合作金库及省银行先后设立温州分、支行 其中有些银行还在平阳、瑞安、乐清等县设立办事处。此外 还有永嘉县、温州人合办的瓯海实业银行。存放汇业务兴旺 保险、侨批、信用合作全面发展。全国性的“废两改元”法币政策等币制改革的金融市场波动 朝发夕至，行庄应对灵活，为沪市金融的尾闾。但温州内陆效能不便，腹地商品经济不发达，各公私行庄的金融业务规范程度尚处于初级状态，信托名实不符，保险普及不足，公债虽多但企业股票、企业债券发行寥寥。抗日战争初期，温州偏安东南隅，成为大后方的出海口岸，一时商贾云集，仅报关转运行激增至上百家，私营钱庄达 30 余家。日寇侵略 温州三次沦陷 为时虽短 但工商业、金融业备遭摧残。银行积极支持战时统制经济 扶持运输业、地方工业、海洋渔业、制革和棉织等业生产 钱庄都兼做南货百货、棉布棉纱、西药五金、颜料油行等生意。放款汇兑扩大经营，银根调拨纷繁。但繁荣景象不长，抗战胜利后 经短时恢复 时局剧变 物价飞涨 币值惨跌 各行庄为求生存，纷纷陷入金、纱交易 表现为金融混乱 暗息左右市场 社会经济面临崩溃局面。

历史上的温州谈不上繁荣或者突出，但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商业文化和竞争进取的商品意识，以至改革开放后的民间信用乃至金融工具，都深深地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众多银行、钱庄经军管、清理、整顿和一系列稳定金融的斗争 人民币占领市场 国家集中信用于人民银行，实行现金管理，控制货币净投放，转入社会主义计划金融轨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温州的资本市场开始形成和活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政府金融改革；二是民间信用活跃。政府金融方面，温州农村信用社率先试行存贷浮动利率制，继而银行全面试行，搞活了城乡金融。后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温州市成为全国利率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民间信用方面，首先是形式多样、规模庞

大的自发民间资本市场活跃发展，包括企业与社会集资、乡镇挂户公司的存贷经营、名目繁多的民间聚会以及银背、私人钱庄活动，这一部分的市场融资量，大约占到农村融资总量的 1/3。其次是金融同业拆借。1983 年行社间自发进行拆借活动，1986 年成立会员制的金融系统短期拆借市场，以后市工商银行、市农业银行系统内的拆借市场，以及部分县支行的县区二级资金拆借市场相继形成。再次是设立证券发行、交易和外汇调剂市场。1984 年温州开始发行企业的债券和股票，1987 年建立证券柜台转让买卖业务。1986 年开办留成外汇有偿调剂业务。与此同时银行开展办理标据竞兑、贴现和再贴现的间接融资业务。综括温州民间信用活动形式大体可分为：民间自由借贷、金融会、金融租赁、银背、私人钱庄、企业和社会集资、非金融机构办理存贷业务、民办农村信用社等。温州资本市场的活跃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温州经济持续迅猛的发展。

本书探讨的“温州民间融资”，主要是指改革开放后特别是 20 世纪末期在温州城乡形成的民间金融信用及其活动。

1.2 研究完善资本市场的突出意义

经济增长是各种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经济增长通常取决于生产函数中的基本要素：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温州发展的经验表明，资本要素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尤为显著的效果。在资本形成过程中，资本市场作为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渠道发挥着重要作用。计量研究显示，资本要素投入对全部增长的平均贡献度超过 50%，并且仍呈不断上升趋势。这再次说明，金融是经济的血液，搞市场没有金融不行。温州经济模式成功的经验之一，可以说是在于他们搞活和用足了资本市场。没有资本市场的充分发展，就没有今天的温州模式。

温州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促动作用表明，建立、完善多元化投融资体制和竞争性资本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内容，资本市

场既为现代企业制度创造条件，也为其提供内部动力和外在压力。资本金短缺曾经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为解决这个矛盾，政府曾采取鼓励储蓄，吸引外商投资等多种手段，吸收和扩大筹集资金，通过储蓄和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以期达到融通资金和解决资金短缺的目的。但从现实发展来看，国有企业对银行过度负债和银行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使银行处于困境境地；中小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的缺口一直无法得到应有的满足；银行资金风险越来越大，对城乡居民的利益也构成了间接的损害。诸多现象显示，银行已难以继续独立承担融通资金的重任。

多种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已使我国进入金融改革深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金融政策将发挥着主导作用。首先，金融政策能够对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组合产生深刻影响，从而促进或制约生产水平的提高；其次，金融政策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速度和稳定性，为体制转轨和金融深化提供外部环境；第三，金融政策的基本取向和具体操作直接关系到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产权的优化组合，对企业上规模、上效益以及实现集约化经营产生影响。第四，金融政策与经济体系的开放密切相关，它影响着汇率政策、外汇管理体制以及国际收支体系的变革和发展，因而更广泛、更深入地作用于长期的经济增长。由于长期的利率管制，中国实际利率通常被压制在一个较低水平，资本形成的数量和质量均受到严重制约，经济增长潜力被大大削弱；又由于名义利率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资金市场中缺乏价格机制来调节储蓄和投资的数量缺口及结构差异。当经济运行中资金缺口出现时，实际利率的升降只能通过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来实现。而这种调整机制具有严格发散性，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不仅无法消除资金缺口，相反会加速资金供求的失衡，导致经济发展中的系统性风险显著增加。因此，金融政策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应重点围绕资本要素发挥作用，通过不断提高实际利率，使之逐步趋近于市场均衡水平，以此促进储蓄和投资相互协调，扩大资

本积累规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金融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改革开放 20 年，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但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并不配套，国有银行独霸天下的格局没有改变，与多种所有制相配套的多元化投融体制没有形成，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的资金困惑仍相当突出；产业调整、产权转让、产品的升级换代，技术的更新改造以及设备的改善，都面临着极大的困惑。现实表明，金融改革明显滞后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方面，居民在银行的存贷存在大量的存差；另一方面，企业资金需求还有巨大的缺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使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必须在“器”字即资本上做文章。没有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战略性重组不能实现，产业升级和产品的更新换代难以施行，居民的切实利益得不到体现，居民投资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资金使用的浪费和资金短缺并存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经济增长的梦想必然受到阻碍。为此，有必要加快直接融资市场的建设，完善多元化投融体制，扩大和开放资本市场，把蕴藏在民间的资本和投资积极性调动起来，即以多元化的竞争性资本市场替代以国家银行为惟一中介的融资体制。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经济增长的要求正在呼唤开放性的资本市场环境，这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开放程度的差距可以得到启示。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是自由开放的，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通常受到政论管制，金融环境的不同造成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具体而言，在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控制货币供给，名义利率能够与预期通货膨胀率相互追逐，两者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趋于稳恒状态；而在发展中国家，名义利率经常是事前给定的，因此央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只能通过计划手段加以实现。而没有自由的金融环境，就没有真正的金融政策和应有的金融效率。

1.3 研究范围及其理论概要

作为教育部的重点课题，本书以 20 世纪 80 年代温州民间融资活动为实证背景，总结和借鉴其成功经验，通过实证的分析和启示，探讨中国多元化投融体制改革和开放性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必要性，核心是回答中国金融政策的发展取向问题。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转制过程中的温州民间资本市场”，共七个章节。主要是介绍和分析改革开放后温州民间融资的情况，突出阐述和研究包括“温州民间借贷”“民间金融会”“温州的银背和钱庄”“温州的典当”“抬会风潮”及“非金融机构的社会集资”等在内的民间信用活动及其影响，此外，温州国有商业银行所作的“浮动利率改革”，因为与当地民间资本市场发展紧密相关，在此一并介绍。下篇：“多元化投融体制及开放性资本市场研究”共八个章节。主要从我国经济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状况入手，探讨和研究资本市场向民间即居民个人和私营经济主体开放的必要性，突出地分析“民间资本的供给”“民间资本的需求”以及“商品经济大潮与民间融资”“金融抑制与经济衰退”“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阐述说明了我国当前完善多元化投融体制和开放资本市场的若干设想。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采用实证法，即在研究过程中凭借一定的事实材料和数据给出判断，从大量数据和案例中得出“是怎样”的看法。所收集的材料和数据中，既包涵了政府部门所作的官方统计，也有来自非官方部门对基层所作的统计调查，一些案例引用了其他一些学者和著述对当时情况的具体反映。

充分发达的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发达的资本市场绝不仅是依靠对外资开放，必然要包涵有对非公有内资开放的内容。由此，研究温州的民间融资具有特别的启示和意义。与温州的独特的经济现象同样，温州的民间融资有着其厚实的基础和独特的内涵。但是，温州的独特的经济现象毕竟是在全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下

的一个缩影或者反映，它说明或影映出全局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因此，研究温州的民间融资就不仅仅是说明或局限在温州，而是要从全面和整体上论述开放、发展资本市场的完整意义。

上篇 转制过程中的 温州民间资本市场

第二章 直接借贷和民间金融会

商品经济的启动发展需要一定数量的资本金 有了资本金 才能购置商品生产必需的工具、设备、原材料和其他物质资料，这是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在发展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迫切希望发展商品生产，就是苦于没有资本金 借贷无门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若有资本金 我们早就发了。”资本金 犹如阿基米德的“支点”。阿基米德说 给我一个支点 我可以撬动大地球。作为发展经济的必备要素，资本金从来就是最宝贵的一种资源，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更突出出其短缺性和重要性。那么，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和内地一样，在既无特别优惠政策惠顾获得内资资助，又无地缘相邻优势获得港、澳、台或外商投资拉动的情况下，是如何解决发展商品经济的原始资本的呢？

2.1 民间直接借贷

自由借贷是民间信用最原始的形式。与传统的互助借贷不同，温州的这种民间借贷绝大多数必须还本付息，利率随行就市；借贷双方主要限于彼此熟悉的个人间、个人与企业之间，少数为企业与企业之间，融资范围狭小，融资数量有限。个人之间的直接借贷，一般没有什么手续 但对借款时间长、金额大的 贷款者则要求借款者打“欠条”。自由借贷的利率变化对资金供求影响最灵敏，因而自由借贷的利率一般可视为民间金融市场资金供需的结果。

1. 温州民间直接借贷

80年代中期，温州城乡自由借贷非常活跃。温州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资金来源，并不是依靠国家拨款或城市大工业的支助，而是依

靠农民家庭自我筹集，这无论是遍地开花的家庭工业，还是星罗棋布的专业市场，以至其他的各行各业，它们的原始资金基本上都来自民间的各种信用。以家庭工业来看，如苍南县宜山区的再生编织品产销基地，历史上该区曾以人们外出讨饭逃荒而出名，1984年该区家庭工业产值1.2亿元比1978年增长近29倍加工的再生腈纶衣裤超过1.5亿件再生布300多万匹塑料编织袋7400多万只……如此规模的再生纺织品加工业，都是靠自筹资金，靠千家万户的积累，靠家庭联产承包或土纺土织传统手工业的少量资金积累。其次是专业市场，如永嘉县桥头镇的钮扣市场，原始资金主要来自流通。桥头钮扣市场是由外出人员带动起来的，历史上早有“桥头弹棉郎，挑担走四方”的传统他们把在外面赚的钱贩运一些小商品到桥头销售，形成了最早的桥头市场，该市场先后经营过塑料花、手套、发夹一直到扭扣最后形成80年代温州著名的钮扣市场。从这里可以隐约看出早期温州民间小本经营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状况。

其他各行各业的原始资金，有的是来自家庭手工业的积累，有的是来自在专业市场基础上的经营，还有的是源于解放前后的长期积累或海外亲戚、华侨的资助。在改革开放以前温州人就喜好开厂、经商、办各种实业，尽管不断地遭到取缔，但也多少积累了一些资金。后来，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原先的各种经营活动进一步发展起来，而其中规模较大者，更是超前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

温州人多地少，解放前就有飘洋过海出国去经商的温（州）青（田）帮人，解放后又有大量的劳务输出，大批人员的外流带回资金回流，这也是许多民间原始资金的重要来源。据有关方面估计，仅1982年—1984年的三年，从海外汇入的款项就有4654万元。而温州人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从事劳务输出的，人数就更多，如弹棉花、做小买卖、做小手艺等，他们每年汇回温州的钱，相当的部分成了家庭工业发展的原始资本。原始资本的创立，使得民间借贷有了基础，并有可能通过“滚雪球”等方式进一步扩大积累。

(1)集腋成裘。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农村工业、商业及各行各业，从一户家庭工业或一个经销商的原始资金而言，数量是较小的。一台机器不过上百元至成千元，一个小商品经销商的经营资金，开始也仅几百元、上千元。但是，这种并不起眼的小规模商品生产和流通，通过较大范围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形成专业村、专业乡以及规模宏大的专业市场，其资金总量则变得大了。苍南县宜山区 1984 年从事各种职业的情况为：采购原料的专业户约 380 多户、原料分拣 600 多户、开发生产的 1200 多户、纺纱和并纱的 6430 户、编织 6490 户、销售产品 2300 户、运输 200 多户。而桥头镇钮扣市场分为外出采购、设摊批量销售和外出推销三道环节，每个推销员一次贩运的钮扣仅值几百元或近千元，但全镇的钮扣经销商的经营资金总额 1985 年就已达到 2000 多万元。这种依靠千家万户投资，积少成多，分工协作，汇集成相当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温州资金积累和资金运动的一大特点。

(2)滚雪球。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特点是产品小、效益高、周转快，因此，初期有限资金就能如同滚雪球那样迅速地扩大。许多家庭工业因此一年翻身、二年致富，以后他们再以更多的资金投入再生产，使自有资金越积越多，越滚越大。根据对 1.6 万户的调查分析，其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之和，在 50 万元以上的已有 400 户，10 万～20 万元的有 1500 户，其中“森力人”针织内衣厂的生产资金，已从 1983 年建厂时的几万元增加到 1990 年的 50 多万元。1984 年苍南县钱库镇有 727 家集体、个体商店摊贩，从业人员共 1435 人，他们的经商积极性高，勤进快销，生意做得活，因此经济效益比国营商业高：资金周转率快 3 倍、劳动生产率高 2 倍；故营业额及利润增长也快，以利润看，1978 年为 80 万元，1984 年为 270 万元。由于盈利逐年增加，使他们的流动资金增长很快，据调查，1984 年比 1978 年增加 16 倍多，经商人员中，万元户有 300 多个，10 万元以上的有 30 多户。

2. 民间借贷市场

原始资金的筹集，对温州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形成必不可少，但是个体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只靠单枪匹马的原始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如温州农村的村及村以下的工业产值，从 1981 到 1985 年四年间增长了 3.4 倍，个体商业的零售额从 1980 年到 1985 年的五年中增长了 27 倍，这就需要有金融的支持，而从事金融的资金，大部分来自民间信用。

我国民间借贷源远流长，是一种古老传统的融资形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当时名为“称贷”“贯贷”“贷子钱”等的高利贷者被称作“称贷家”“子钱家”。据史书记载，齐国有个名叫孟尝君的人，放债的年息收入逾 10 万以上；西汉有位无盐氏，趁吴楚等七国之乱急需钱购置军需品之机，以 10 倍的年息贷出千金，一举成为关中的富翁。到了魏晋南北朝，民间借贷称为“出贲（债）”“放债”“举贷”等，经营高利贷的多为豪门世族、官僚、地主。唐代高利贷的盘剥也十分严重，思想家陆贽曾描述道：“契担囊，行复贷，假重重计息，食每不宽，倘遇荐饥，遂至颠沛，室家相异，骨肉分离，乞为奴仆，犹莫之售。”元朝则盛行“羊羔息”，一年翻一番，很多百姓负息太多，以致“奴其妻子，犹不足偿”。在明清时代，民间借贷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并且随着民族资本家的出现，借贷资金开始有部分用于经营之需。

民国年间，我国高利贷变得十分猖獗。在浙南一带，许多高利贷出 1 元借者实际只得 9 角，1 个月到期归还本利 1 元 3 角，故名“九扣十三归”。在江北地区，流行一种名为“驴打滚”的高利贷，贷款一月为期，利息率高达 40%~50%，到期若不还，则利息加倍，即按 80%~100% 计算，利上加利，越滚越多，如驴翻身打滚一样，民间有歌谣唱道：“春天放下驴打滚，秋天连人一口吞。”

新中国成立后，高利贷很快销声匿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间借贷更加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一晃就是 30 多年，其间社会上存在的私人借贷一般是亲友之间互通有无的借贷，绝大部分是无息

或低息，不以盈利为目的。进入 80 年代，由于经济的日益商品化，民间借贷又活跃起来，并逐步衍生出高利贷，由互相借贷向主要经营放债发展，利息显著提高，1981 年以前为月息 3~5 分，1984 年以前为月息 6~7 分，1985 年以后月息达成 10 分左右。

(1)农村民间直接借贷的借方

农村民间的直接借贷长期存在，屡经禁止，仍然时隐时现。它的特点是借贷自由、利率面议，借贷对象包括农村各种成分对象，用途由解决生活困难为主转向解决生产营运资金为主，用于生活的主要是提高生活水平，如建房、婚嫁、购买高档消费品等，由此引起自由借贷发生了质的变化。

据对温州三个县的 800 户农民的调查，借“高利贷”者为 116 户，占 14.5%。他们借“高利贷”一是用于发展生产，约占 31.9%，如 1993 年春，某村一高利贷者利用春耕资金需求旺盛之机，将平时月息 10% 可以借到的资金提高到 20%，该村有 18 户农民以青苗或牲畜作抵押借 1 万元，月息为 15%，期限 2 个月，贷主扣息 3000 元。这类借款因用于发展生产，资金利用率高，能很快使经济发展，所以许多农民愿意贷款。二是借债盖房子或娶媳妇，约占 36.2%。这类借贷者比例高，借贷数额大，往往短时间还不起，容易背上“驴打滚”的债，有的全家几年的劳动成果被盘剥而去。三是借款投资经商，约占 20% 以上。四是部分人员借债赌博。

另外，据对温州市 314 个借贷户的调查，用于经商的为 154 户，占 49%，金额占 60.6%；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 32 户，占 10.2%，金额占 22.2%；用于搞副业的 68 户，占 21.7%，金额占 12.8%；用于婚嫁丧娶的 20 户，占 6.4%，金额占 1.2%；用于建房的 24 户，占 7.6%，金额占 1.2%；其他 16 户，占 5.1%，金额占 2%。

据对 5 个乡的不完全统计，1993 年从事民间借贷人员比 1990 年增长 11 倍，借贷总额 80 多万元，比 1990 年增长 16 倍，主要原因是社会资金供求矛盾的激化，促进了民间借贷的发展。

(2) 农村民间直接借贷的贷方

过去的农村，民间贷放者一般是将手中闲置不用的养老金和其他积存资金作暂时放贷，不以放贷谋利为主要目的。随着农村个人持币量的增加，特别是那些放债较早尝到放债甜头的人，通过几年“滚雪球”资金力量雄厚起来，便产生了专营放债的念头。如瑞安市某村有 400 多户人家，私人拥有资金 6000 多万元，拥有 30 万元以上的占 20%，拥有 20 万元以上的占 20% 以上，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放贷。

(3) 城市民间直接借贷的借方

在城市，高利贷的借方往往是为了“发家致富”，而心甘情愿地“自投罗网”的一批致福人，或为做生意，或为出国、买房。如温州市某王老板家住繁华地段的街面，1984 年辞职办餐馆，为了将餐馆装饰得豪华气派，以招徕四方食客，他向别人借了 1500 元，月息 9 分。由于地段佳，环境雅，加上经营有方，不出 4 个月，就连本带息还清了债务，而他自己早已成了腰缠万贯的阔佬。

(4) 城市民间直接借贷的贷方

放高利贷，一般以月为结算周期，而且月息很高，大多数在 5~20 分之间，于是腰缠万贯的个体户、落实了“政策”拿到大笔钱的富人、克勤克俭的普通市民，甚至在流通领域中以不正当手段发了横财的所谓“国家干部”都加入了放高利贷的行列，有些高利贷者还搞起了联合道路，甚至出现了“公对公”的高利贷现象。

个体酒吧业主叶某凭借家住大宾馆附近的“地利”优势，率先破墙开商店，捷足先登赚了一票。另一家同样占有得天独厚条件的程某也想开商店赚钱，却为缺钱而发愁，经人引荐，结识了叶某，两人各有所图，一拍即合，叶某爽快地答应借给他 3 万元，月息 10 分，一月为期。叶某心里很清楚，开商店谈何容易，不要说一个月，就是一两年也很难还清本息。结果不出叶某所料，程某月月赚钱，月月还债，一年内的商店等于为叶某所开，到还清之日连本带息差不多翻了

一番。

放高利贷有如此诱人的魔力 无怪乎那些本是安分守己、一向省吃俭用搞点积蓄存银行的普通市民 也不由得走这条发财的“捷径”。有一对姓许的夫妇是双职工，经济上并不宽裕，只是因为精打细算，才有了一点积蓄，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以 8 分利向他们借了 2000 元，1 个月后就获利 160 元，初次出手尝到了甜头，他索性将存在银行的另外 2000 元统统取出来放高利贷，几经转手，这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多，一年的时间 4000 元居然魔术般地变成了 8000 多元。

2.2 金融互助会

民间金融互助会是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信用形式，一般是由发起人（称为“会主”）邀请亲友若干人（俗称“会脚”）现代语为“会员”参加 约定时间按期举行 每次收集一定数量的会金 轮流交一个人使用借以互助；“会主”优先收取第一次会金 以后按次序轮流交“会员”使用。按会前约定的次序轮收的称为“轮会”以摇骰方法确定收会的称为“摇会”用投标方法竞争得会的称为“标会”。

解放后，“金融互助会”活动在城乡仍有少量存在 有关部门虽提倡组织职工互助会，意在取代各种类型的“呈会”，其间还曾一度将“合会”视同高利贷的一种形式，予以打击，但终未能使其销声匿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村资金供求矛盾突出，“金融互助会”这种民间信用在温州农村又重新活跃起来 特别是商品生产和流通发展较快的地区，“金融互助会”更为广泛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活动形式多样 名目繁多 会中有会 情况复杂 规模庞大 涉及面广。

1.“会”的概述

“聚会”起源于“合会”。所谓“合会”一般由发起人（称“会头”）邀请亲友若干人（称“会脚”）参加 约定每月、每季或每年举会一次。每次各邀一定数量的会款 轮流交由一人使用 借以互助 互通有无 救急解难，

一般不计息或低息借贷。在温州农村，“聚会”是 80 年代最为盛行的一种民间集资信用活动。“聚会”的形式很多，诸如“轮会”“摇会”“卖会”“哨会”“排会”“压会”“票会”“单干跟”“押会”“转会”“八年四”“摸会”“抬会”等等，名目之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根据每会金额不同，又有“千元会”“万元会”乃至数十万元会。存续时间短者 1 年左右，长者可达 8 年 5 个月，会员少则 2 人，多则上百人，参加对象几乎囊括温州城乡各个阶层：农民、个体工商户、城镇居民、工人、教师和干部等等，还有相当数量的外县、市人。其中不少人同时入 3~4 个会。

据估算，温州“聚会”融资规模达数亿元之巨，入会者达数十万人。

“聚会”是利义结合的产物。从其利义关系的发展情况看，主要有三种类型的“聚会”：

一是互助性的“聚会”。传统的亲友之间的经济互助会，这种会规模小，形式简单，时间短，人数不多，一般十来个人，对象多数是亲朋挚友。这类会没有信用中介人，由会主（发起人）同各个会脚（即会员）直接发生关系，一般是需要互助时才呈会，在个人之间进行货币拆借。会款主要用于生活方面，如建房、婚丧嫁娶或添置高档耐用消费品等，也有的是用于筹措生产经营资金或解决临时性生产经营资金周转困难。参与这类聚会的会员大多数是亲朋好友，关系比较密切，因而其会金利率一般较低。

二是筹资性“聚会”。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手持现金的增加，“聚会”从互助性转向经营性发展，充当信用中介人、筹集资金的会主以获得利差为目的，从事货币拆借业务。先收取会费的会员要付给后收取会费的会员以较高的利息（一般从会费中倒扣），后收会费的会员则少付利息或收取一定的利息。会金月息一般为 2% 至 2.5%。据匡算，经营一个万元会，会主每月得利息 300 元左右。如乐清县柳市镇大会主王小兰，自 1976 年经营聚会以来，10 年间经营“千元会”“万元会”等 190 余个，其中百人“万元会”50 个；“聚会”资